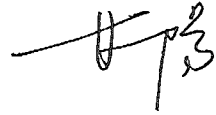


## 外交不是內政的延長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今日西方的主流仍然是亨廷頓的「實力政治論」而非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從長遠的觀點看，所謂共產主義只是東西方真正遭遇前的一個插曲。下一世紀或許將是東西方真正面對面的開始。只有心懷文明衝突的警懼之心，方有爭取文明不衝突的可能。

冷戰結束後的最初幾年，西方的主流論述之一是由日裔美人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所謂「歷史終結論」，即認為蘇聯東歐的變局所意味的，「不僅是冷戰的結束，也並非只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過渡，而是歷史之為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as such)」。福山這一論點先是由《華盛頓郵報》爆炒，繼之則《紐約時報》、《時代》周刊等競相鼓噪，自然引得世界各地媒介緊緊跟上，唯恐落後於主流。

「歷史終結」這一命題其實是人們耳熟能詳的老命題。我們以往自然都聽說過，人類歷史將終結於共產主義社會，屆時不但將是人人豐衣足食，而且是人類親如一家的大同世界。福山現在要告訴我們的無非是，人類歷史不但將會而且已經終結於自由民主社會，因為即使現在還不是自由民主的社會(他稱為「尚在歷史中的社會」)，也都必然會變成歐美般的自由民主社會，即他所謂「擺脫了歷史的」(post-historical)社會。這一說法自然很容易讓我們想起恩格斯當年關於共產主義將標誌「人類史前史的終結」這一著名命題。換言之，福山實際是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以往人們寄托於共產主義的種種夢想轉嫁到自由民主社會，還更樂觀地把將來時直接改成了現在時，無怪乎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在專駁福山的一篇文章中要刻薄地挖苦他說：「福山的命題不但沒能說明馬克思主義的消失，反而恰表明馬克思主義的無所不在，因為福山的歷史終結觀正直接來自馬克思。」<sup>①</sup>

但「歷史終結論」雖然風靡一時，一般人大多忽視的是，福山1989年文章的初旨本是討論國際關係的，這不僅因為福山本人當時供職於美國外交系統——美國國務院東歐司，而且發表福山文章的《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本是美國的一份外交政策季刊，第一個組織該文討論會的則是由美國退休大使們為主體的官辦「聯邦和平研究所」(*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事實上，福山當時的主要雄心是要挑戰西方國際關係和外交決策的主流理論，即由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莫根朔(Hans Joachim Morgenthau)、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等所奠定，而由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全力貫徹的「實力政治」理論(Realism)。正是在這裏，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福山理論與馬列理論的驚人一致性。我們知道，正統馬列主義外交理論的基本出發點認為，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國際衝突的主要根源是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福山完全同意這一看法，只不過作了一點「發展」，即認為，冷戰結束標誌着意識形態的衝突已經結束，而西方自由民主社會制度則已成為所有其他國家的嚮往，因此國際衝突的主要根源已經消除。福山由此大膽宣稱，西方「實力政治」國際關係理論已經過時，後冷戰時代需要新的國際關係理論。

但是，與正統馬列主義外交理論截然不同，西方「實力政治」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恰恰是認為，外交並不是內政的延長，國際衝突的主要根源並不是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恰恰相反，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意識形態往往只是一個國家達到其國家利益的手段(即最大程度地動員本國資源)，因此一個國家改變其社會制度或意識形態並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其外交政策<sup>②</sup>。「實力政治」理論堅信，恰如任何人只要可能就想支配他人一樣，任何國家只要可能同樣都想支配其他國家，或最低程度力圖不受其他國家支配；這種支配和反支配的衝動驅使各國都必然以各種手段自我「擴張」(與他國結盟就是擴張的一種手段)，而這種擴張即使是純粹防禦性的也必然只能進一步加深他國的不安全感。國際衝突的根源正是在於這種任何國家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完全擺脫的不安全感和擴張本能，因此任何期望有朝一日國際衝突有可能根本化解的想法都是不現實的，各國尤其大國必須立足於本國實力去爭取本國最大利益。「實力政治」理論尤其強調，國際關係中朋友和敵人的選擇並不是由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所決定，而是由對國際關係之實力對比的判斷所決定。

由此，毫不奇怪，《國家利益》雜誌在發表福山文章後的第二期立即發表了今日「實力政治」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亨廷頓的文章，全面反駁福山理論<sup>③</sup>。在亨文看來，不論俄羅斯在共產主義後選擇甚麼樣的社會制度，都不會改變其擴張主義的衝動，因為這種擴張主義乃是俄羅斯人民的利益所在。亨廷頓文章的標題即為〈無路可退：終結論的謬誤〉(“No Exit: The Errors of Endism”)，換言之，在「實力政治」理論看來，在爭取本民族大利益這一點上，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沒有退路。因此，對西方國家而言，冷戰的結束決不意味着西方可以從「實力政治」立場後退。事實上，我們今天已經可以看得再清楚不過，不管俄羅斯如何央求如何反對，西方都毫不動搖地堅持擴張「北約」，以致任何人今日都再不會懷疑，西方與俄羅斯之間的蜜月已徹底終結。

頗耐人尋思的是，非西方國家特別是原共產黨國家的知識份子通常都對福山理論大有好感，而對亨廷頓的論點卻不以為然。這自然不難理解，因為福山給出的是花好月圓的美好前景、特別符合今天人人都想成為西方一份子的普遍心理，而亨廷頓從反對歷史終結論到提出「文明衝突論」，則大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味道。然而，可以毫不誇張地講，今日西方的主流仍然是亨廷頓的「實力政治論」而非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這首先可以從《國家利益》雜誌這兩期專刊

(即刊載福山文的1989夏季號和刊載亨文的秋季號)中見出，其中幾乎無一人同意福山的觀點。在「聯邦和平研究所」的討論會上，情況同樣如此。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大膽斷言，儘管今日國際關係理論不乏新說，但「實力政治」在西方外交決策中的主導地位決不會被輕易取代，這不僅是因為目前各種所謂制度主義流派尚遠不足以真正挑戰「實力政治論」，而且更因為，「實力政治論」事實上乃深植於基督教西方的基本世界觀。美國「實力政治」外交理論由著名基督教神學家尼布爾從基督神學立場一力奠定，實深刻反映基督教西方對「塵世」的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即塵世永遠有魔鬼撒旦。如果說「歷史終結論」事實上是把基督教的「末世論」(Eschatology)不合法地從天國挪到了塵世<sup>④</sup>，從而過於性急地宣告人類已統一於西方極樂世界，那麼「實力政治論」則執着於充滿危機意識的基督教「啟示論」(Apocalypse)，因而堅稱一個撒旦降服了，另一個撒旦必然會出現。由此而言，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不僅只是實力政治的國際戰略分析，而且幾乎是基督教西方在冷戰結束後唯一順理成章的必然結論。

史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曾經指出，二十世紀並不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相對抗的時代，也不是伊斯蘭與西方相對峙的時代，而是西方與東方相遭遇的時代。從長遠的觀點看，我們或許可以認為，所謂共產主義只是東西方真正遭遇前的一個插曲，亦即一個夾在東西方之間的民族(俄羅斯)耽擱了一下東西方文明的遭遇。下一世紀或許將是東西方真正面對面的開始。但反駁亨廷頓乃是全然無謂之舉，因為如果你非西方世界的人願意一切跟着西方走，那你就已不必和他爭論；如果你不願意，那就更不必和他爭而不如欣然接受他的看法。這不是說誰願意文明衝突，而是說，只有心懷文明衝突的警懼之心，方有可能爭取文明不衝突的可能。

所謂「歷史終結論」或許可以理解為，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已經終結，儘管非西方的歷史能否開始或如何開始尚無人知曉。

### 註釋

①③ Samuel Huntington: "No Exit: The Errors of End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89), pp. 3-11.

② 順便應該指出，福山的理論雖然常常令人想起50年代貝爾(Daniel Bell)和雷蒙·阿隆等人的「意識形態終結論」，但兩者之間的一個重大不同恰恰在於，貝爾等當年的一個基本論點就是要反駁馬列主義的「外交是內政的延長」觀，而力主外交關係乃是各民族歷史形成的長期民族利益之體現，並非各民族內部階級關係消長之反映。參Daniel Bell: "Afterword 1988: The End of Ideology Revisited, In Memory of Raymond Aron", *The End of Ide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21.

④ 「歷史終結論」的這一「不合法性」(illegitimacy)早由保守主義思想史家呂維士指出，並引發晚近以來關於「西方現代性是否有合法性或正當性」這一大辯論。福山似完全未注意到這一重大辯論。參Karl Löwith: *Meaning in History* (Chicago, 1949); Hans Blumenberg: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The MIT Press, 1983).